

历史深处的文学记忆

——抗战题材作品中的英雄群像

■李西岳

作家与作品

土壤丰厚,方结硕果

我是读着抗战文学的红色经典长大的,也是在这些作品的感染和鼓舞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我在阅读和观过程中发现,《荷花淀》《新儿女英雄传》《野火春风斗古城》《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战斗的青春》《平原枪声》《平原游击队》《平原烈火》《腹地》等小说、《地道战》《雁翎队》《小兵张嘎》《回民支队》《狼牙山五壮士》等电影作品,描写的是河北人民血与火的抗日斗争生活,刻画的是燕赵儿女抗战英雄的形象,它们所具备的文学价值和作品品质,不仅成为中国敌后抗战文学的典范,同时也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

发生在20世纪的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战争。抗日战争旷日持久,悲壮惨烈,中华大地上狼烟四起,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应该说,在不同的战区、不同的根据地,都会留下有着不同地域特点的抗战文学作品。流传至今的抗战文学经典作品有很大一部分发源于河北,而又相对集中于冀中地区。我查阅了大量河北抗战史料,并在2005年沿着当年的晋察冀根据地版图实地走了一遍,访问了许多抗战老兵和老作家。我初步的认识是,这与河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抗战背景有直接关系。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河北很快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中心。1940年百团大战之后,被称为“中国通”的冈村宁次机接替多田骏赴任日军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他认为,华北的“治安”形势糟糕,根本问题在冀中。当年,冀中有“八路军的米粮仓”之称,是冀中平原的老百姓送粮送棉支持了山里的八路

军。于是,冈村宁次下决心,要用5万大军对冀中进行大扫荡,用竭泽而渔的手段来瓦解八路军与老百姓的鱼水关系,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彻底摧毁冀中的抗日武装力量,这就是惨绝人寰的1942年“五一”大扫荡。这次大扫荡长达数月,被抓、被杀害群众5万余人,成为日军侵华史上在中国农村制造的最大惨案。

在实地走访和查阅资料中,我感受到,这次惨绝人寰的大扫荡虽然给冀中抗日根据地造成了巨大损失,但也极大地激发了冀中军民的反抗勇气和斗争精神,创造了许多英雄传说。自古燕赵多悲壮之士,从文化源头上来看,在燕赵的文化和精神里面,有血性、有情怀、重传统。三种文化元素相互渗透,构成了“勇武任侠”的显著特征,英雄的燕赵儿女在抗战斗争中则把这一文化特征彰显得淋漓尽致。“宁做刀下鬼,不当亡国奴”成为每个人的口号;毁家纾难,视死如归也成为每个人的真实行动。狼牙山五壮士、回民支队马家母子两代英雄、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工人抗战英雄节振国、儿童抗战英雄王二小等,这些抗战英雄都诞生在燕赵大地。

值得一提的是,在冀中“五一”反“扫荡”中,我的家乡冀中父老不仅彰显了血性,更凸显了智慧,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等战法;雁翎队、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抗日武装也相继成立;同时,也留下了以这些战争样式为范本的文艺作品,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受这些作品的影响,我花费十年时间创作了一部40万字反映冀中军民抗战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血地》。我的创作用意,就是想让读者看看,当年冀中这片美丽的热土是如何被铁蹄践踏、鲜血浸染,冀中军民是如何在刀尖上行走的。

与其跪着屈辱地死,不如站着为尊

严求生。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投笔从戎,奔赴抗日战场。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笔,一边打仗,一边创作。他们根本不是什么作家、诗人,他们是战士,也是英雄。比如,《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曾担任过冀中区妇救会宣传部部长;《平原枪声》的作者李晓明,是县大队的政委;《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是锄奸干事;《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作者李英儒,是游击队步兵兵团团长;《敌后武工队》的作者冯志,曾任武工队小队长……他们都是日寇的拉网扫荡、铁壁合围中闯过来的人,他们的作品完全是生活的经历、战火的熏染。

如果仔细梳理一下这些抗战文学作品,不难发现,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弘扬民族正气,叙写民族史诗,讲述精彩故事,塑造英雄形象,用文学颂扬燕赵儿女爱国、救国、报国、殉国的家国情怀,从而迸发出感染、教育、启迪的强大精神力量。比如,田间的诗《假如我们不去打仗》:“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试想,这首诗在当年具有多么大的震撼力与号召力。

孙犁的《荷花淀》《芦花荡》等系列抗战题材小说是叙事与抒情相互融合、写实与写意相得益彰的整体,作品散发着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情韵和气息,小说所传达的战争中的人性美、人情美、风俗美,成为一道特殊的抗战文学风景,给苦难的中国人民带来希望和精神滋养;而其作品进入中学课本,不仅使青少年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同时也受到艺术感染和美的熏陶。

小说《小兵张嘎》《平原烈火》的作者徐光耀是年过九旬至今仍在健在的抗战老兵,后来改编成电影的《小兵张嘎》幽默诙谐,寓教于乐,久映不衰。徐光耀曾说过这样的话:“久而久之,那些与自己最亲密、最熟悉的死者,便会在心

灵中复活……倘不把他们的精神风采化在纸上,就对不起良心。”在这种良知的感召下,老先生矢志不渝,笔耕不辍,在其晚年又创作出版了长篇散文《昨夜西风凋碧树》,并斩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这在他们那一代作家当中是不多见的。

这些抗战文学把燕赵大地的抗战图景描绘得波澜壮阔,把燕赵儿女的慷慨悲壮展现得淋漓尽致,也让抗战英雄形象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记忆。如《烈火金刚》中的史更新、肖飞,《敌后武工队》中的贾正、魏强,《平原枪声》中的马英、王二虎,《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金环、银环,《小兵张嘎》中的嘎子、罗金保……这些英雄都有着远大的革命理想,这种理想远远超过了自身生命、个人情感以及家族利益。在这种理想指引下,他们充分展示出了非凡的勇气、超人的意志、坚韧的毅力、高尚的情操以及出众的智慧,从而使这些英雄形象光彩照人,令人肃然起敬。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我们,没经历过抗战,我们就是从这些作品中认识英雄,感受英雄,进而崇拜英雄的。应该说,抗战文学为读者贡献的英雄形象是功不可没的,是有划时代意义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是历久弥新的。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再次审视这些红色经典文学作品就会发现,一些英雄形象因过于高大而缺少鲜活,因性格单一而失之丰满。

当然,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不能过于苛求那些创作红色经典抗战文学的作家们。就他们自身的经历和阅历而言,还难以走出某种局限与窠臼,这是一种客观存在。当年,他们在青少年时期便走出家门,走出校门,投身抗战,既为中国抗战事业贡献了青春力量,又为读者留下了那么多感人、教育人的优秀文学作品,这就足以令我们后人敬仰与尊崇了。

正是因为选取了这样意蕴深刻的大事件作为结构基础,同时记录了与其相关的人物和事件,才使得这部报告文学作品见人见事,情景交融,既有思想的深度、时空的广度,也有时代的温度。

此外,这部报告文学作品的叙述是通过空间顺序组接来完成的。报告文学写作中,以空间的转换作为组接各部分内容的方法就是空间顺序组接。这是一种结构方法,也是一种文学写作方法。这部作品运用了非常多空间顺序组接的方法,有场面的描写,有场景的描述,有人物群像的塑造,也有访问调查。应该说,流畅的叙述中较好地融合了田野调查、报告文学的纪实传统和作者自己的文学思考。

正是因为较好地融合了文学性与新闻性,《幸福的旋律》让我们在一个看似平淡的故事中感悟到时代的变迁,在一组组看似枯燥的数据中看到了脱贫攻坚以来西藏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在一件件看似平凡的小事中看到了各族人民坚韧不拔脱贫攻坚的信心、决心和毅力。虽然没有宏大叙事,却奏响了时代的黄钟大吕;虽然没有惊心动魄的事件,却书写了时代的风云传奇。

新书推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炮火的进攻让王戈文感觉像坐在乱蹦乱跳的烈马上,耳鼓迫紧,脑袋一阵阵发晕,胸口像堵了稻草一样难受,不是亲历的人,无从理解,真的可以将人震死,即使死不了,也会连想死的心都有了。”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已远离战争多年,但阅读张俊南的长篇小说《吹开枪口的硝烟》(解放军出版社),主人公王戈文进攻粉子山的描写让我们如同直面战场的残酷,几乎可以听到浓浓的硝烟味,听到不绝于耳的枪炮声,在过去的历史与当今的现实之中产生共鸣,感悟到真实的残酷战争。

张俊南在尊重历史和坚持美学追求的原则下去构建故事,用文学的眼光拓展故事的空间。1944年夏秋之际,16岁的作品主人公王戈文在参加胶东军区“学兵团”培训后成为一名军人。他多次闯入日伪据点抓“舌头”、潜入海庙口炸毁日本人运矿石的轮船;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参加莱阳战役、昌潍战役、兖州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进军福建等重大战役,屡立奇功。《吹开枪口的硝烟》以灵动、鲜活、流畅而富有张力的语言叙述故事,通过王戈文由战士、副班长、班长到团部书记、排长、团司令部参谋、副连长、连长的成长经历,将战争的激烈与残酷及革命军人的战争智慧完整展现,帮助读者了解战争、体会战场实况。

象山阻击战中排防御作战,敌人打出的空爆炮弹,在空中炸出一团黑烟,黑烟之中弹片呼啸,一阵烟雾就意味着一场惨重的伤亡;济南战役中的连攻作战,将一个5公斤的炸药包点燃扔进城墙前的护城壕,轻重武器全部从打开的墙洞里伸出枪口,对着城墙上各自预先锁定的目标猛烈开火,战场上硝烟弥漫,看不见开火点,只能听到枪声炮声此起彼伏;淮海战役曹八集战斗中的连进攻作战,十几枚烟幕弹甩出去,借着层层烟雾,队伍一股脑儿涌进北门……小说中战斗场面描述逼真,战术行动叙述得极其精彩,这是作者张俊南数十年磨一剑的结果。

张俊南在4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走南闯北到过全国各地的军营,接触过许多优秀的军人。他能写出战争的真实,与自己的军旅体验和数十年如一日的采写记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2005年,他开始筹备写作一部真实可信、反映战场的长篇小说,构思一个鲜活、智慧、独具特色的战士形象。为此,他多方采写,查阅资料,整理了厚厚的笔记。到2016年,这个故事经过十余年的构思打磨,终于能够比较真实全面地反映那一代军人最本真、最鲜活的面貌。

战争是一种需要阳刚血气并充满智慧的人类活动,军队强调高度集中统一,却又常常能包容个性,王戈文就是这种个性的存在。王戈文果断、坚决、

烛照历史的真实

——读长篇小说《吹开枪口的硝烟》

■孙阳雪

心理强大,第一次击杀人就没有丝毫的恐惧和犹豫。他坚强、勇敢又不失灵活,在面对敌人的进攻时敢于迎难而上,在合适的时机也能够灵活撤退。他是个有智慧的英雄,能够从细微处发现机遇,注重学习实战经验,身边班长、排长、营长等都是他学习的对象。对于王戈文来说,书本从来不是过目即忘的消遣,他善于从历史中学习。为了摧毁日军盗窃的汽船,他借鉴《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火攻赤壁的办法,将炸药绑上舢板,借助风力完成计划。他更善于从工作中学习,挫折和失败都能给他提供经验,针对敌人的不同特点总结运用灵活多变的战法。

军旅文学如何提高真实性与生动性,让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作品中的场景,《吹开枪口的硝烟》是一个较为成功的创作实践。宏观上讲,现实主义强调对生活的观察与体验,力求使艺术描写符合生活的原貌。另一方面,作品的真实也体现在对于细节的重视,细节失真艺术形象便会失真。张俊南小说中的战争穿插着大量的细节描写,宏观与微观皆贴近现实,再现战场原貌,从而搭建起一个能真实反映历史、烛照现实的文学框架。

多一些深度阅读

■张望李 晏宏程

书苑随笔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时下,不少人习惯读网络小说或社交媒体推送的一些内容比较浅易的文章,这种阅读方式因简单轻松、实用有趣,又能从中获得内容丰富、实时热门、图文并茂的各类资讯,所以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喜爱,成为阅读新趋势。

客观上说,“浅阅读”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快速获得信息,扩大知识面,甚至在忙碌中可以拥有一份闲情,在快节奏中暂停脚步,让心灵得到短暂的放松。这本无可厚非,但如果仅仅把读书当成简单的休闲方式,甚至把时间和精力全花在娱乐化的作品上,实在是巨大的浪费和遗憾。

“读什么”“如何阅读”决定着一个民族思想的深度和高度,对文化传承、国家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人人都仅仅满足于“浅阅读”,或者过分热衷于“浅阅读”,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将会产生不良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在高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很多学者反而主张采取一系列措施重新唤起“深阅读”的原因。

徜徉书海,唯有用“深阅读”去领略那些对我们的人生富有启迪价值的书籍,才能让我们的心智更加成熟,让我们的行动更有力量,让我们的生命焕发出夺目的光彩。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经常“深阅读”的人与一个经常“浅阅读”的人,抑或是根本不读书的人相比,人生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因此,“深阅读”不仅不可或缺,还极为重要。

“深阅读”读什么?读那些经过历史

反复检验、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经典著作。这些著作凝聚着人类智慧和文明的精华,其思想深刻、内容博大,不经过深度阅读就难以领悟其中积淀的深厚内涵。因此,我们要原原本本、逐字逐句、逐段逐篇地读,反复琢磨,细细咀嚼,仔细研究方能得其要领,掌握其精神实质和真谛。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有的经典著作晦深深奥,浮光掠影不行,浅尝辄止也不行,需要我们摒弃浮躁,心无旁骛,多研、深思、善悟,做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只有把研读与思考结合起来,将历史与现实连通起来,让理论与实践互动起来,围绕重要知识点深挖原理,理透背景知识,才能掌握要领、增长智慧。只有拓宽阅读的视野和广度,提高知识源的覆盖面,才能真正扩展自己知识的纵深度。

作家余秋雨当年曾沉潜于浙江省奉化市大桥镇的一座藏书楼中研读中华古典文化典籍,他感慨地说:“我的生活立即变得纯净,我的心态变了,好像层层叠叠的山坡山树山岚一齐拽着我离开了山下的浑浊喧嚣,使我飘然升腾。”虽不能说这次“深阅读”改变了余秋雨,但它促使余秋雨开始慎重地思考一个大课题:什么是华夏文明?什么是华夏子孙?是深度阅读激发了余秋雨的求知欲,又促使他将文化的魅力传播给更多愿意投身书籍的人。

其实,选择“深阅读”就是一种精致的生活,一种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生活态度。比起在线浏览,以快餐式、跳跃性、碎片化为特征的“浅阅读”,显然获取的精神财富和文化知识要多得多。

细腻描绘脱贫攻坚时代画卷

■点金

经典重读

每一次回味都有甘甜

兼具新闻性与文学性,是报告文学的文体要求。长篇报告文学《幸福的旋律——西藏脱贫攻坚交响曲》(广东经济出版社,以下简称《幸福的旋律》)正是这样一部兼具新闻性与文学性的优秀作品。《幸福的旋律》选取西藏东部的昌都、中部的日喀则和西部的阿里等4个典型区域为代表,以点带面,以生动的细节、质朴的故事、翔实的数字,为读者展现出一幅西藏脱贫攻坚的时代画卷。

报告文学要书写时代画卷,反映事物的本质,就需要作者通过新闻的手段去发掘意义、寻找素材。这部报告文学作品运用扎实的新闻采写手

法,从十年前昌都的一个小村落写起,共分四个乐章:第一乐章“昌都:一个村庄的故事”,书写了作者的驻村经历;第二乐章“日喀则:珠峰脚下的梦想”和第三乐章“阿里:高原新牧歌”,展示了2018~2020年间几个县脱贫攻坚中的人物与做法;第四乐章“噶尔:县域新模式”,通过噶尔县这样一个样本,展现了西藏县域发展的新路径。作者的采访是扎实的,大部分都是亲历的,所以有着巨大的艺术感染力。特别是作者在叶巴村的驻村经历描写得非常细腻真实,比如藏族同胞给工作队供应柴火、背水,青年人骑着摩托车在村镇兜兜风等细节,如果没有进行扎实的田野调查,难以写出这样素描般的艺术效果。

同时,报告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是因为必须运用形象思维,运用形象化的方法反映时代和生活。它必须塑

造鲜明的人物形象,运用典型生活场景书写具体可感的时代元素。在文学性方面,这部报告文学的结构有可圈可点之处。整部作品运用的是事件结构,以西藏脱贫攻坚作为结构的核心和基础,无论地点的转换、事件的发展、人物的活动,都是在这个大的框架之下运行的。应该说,作者运用“串珍珠”的办法,从雪域高原自东向西,把脱贫攻坚中的4个地点、100多个人物串联起来,给我们留下了西藏在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群策群力脱贫攻坚的熠熠闪光的珍珠般的时代记忆。

事件结构的报告文学涉及的社会生活面广,必须用事件来贯穿整部作品。这部报告文学作品是西藏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的一个缩影。西藏的脱贫攻坚与西藏的平解放一样,是西藏当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

视觉阅读·夏收

陈俊义摄

长征

第5497期

迷彩书屋

